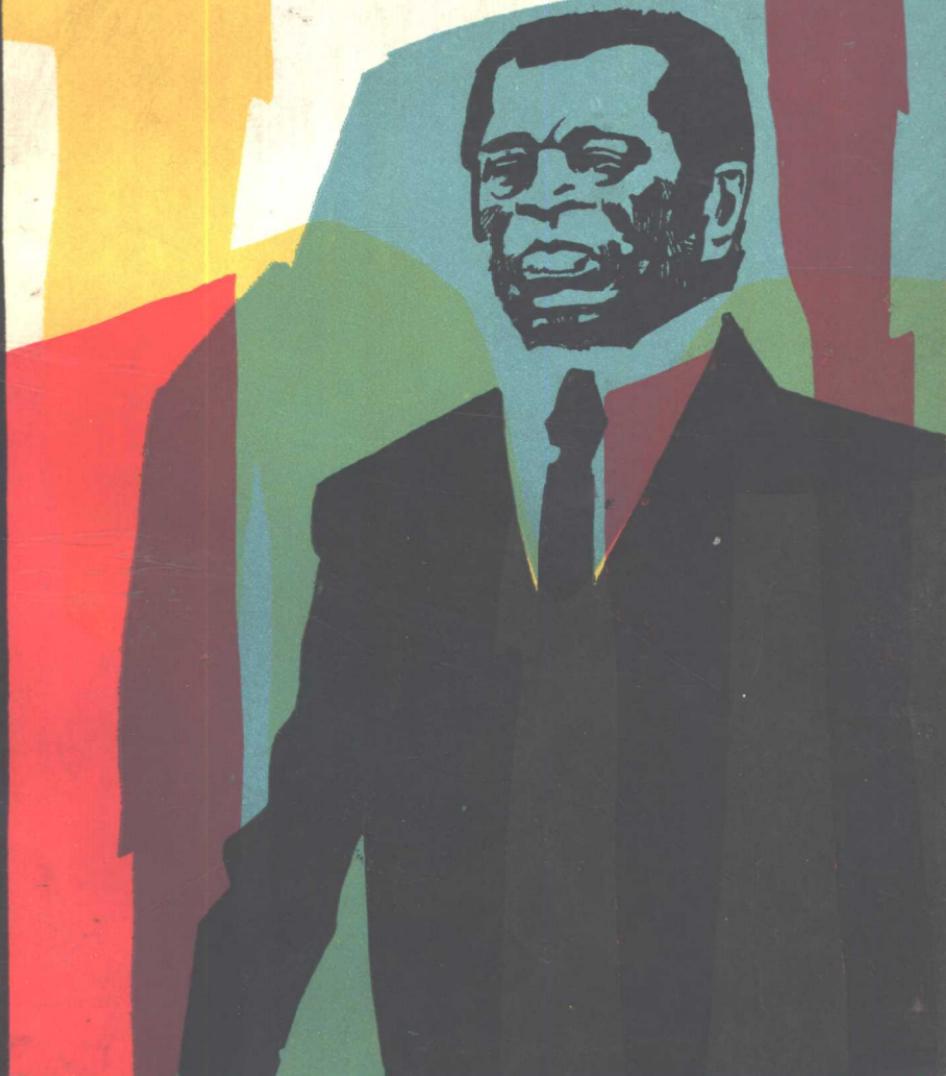


非 洲
文 学 从 书



人 民 公 仆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著



人民公仆

〔尼日利亚〕 饮努阿·阿契贝 著

尧雨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CHINUA ACHEBE
A Man of the People

根据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66 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长荣
封面设计：秦 龙

人民公仆
Renmin Gongpu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0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2}$ 插页 2

198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2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630

ISBN 7—5016—0007—4/I·8

书号 10208·283 定价 1.05 元



第一章

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姆·阿·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下午，南加先生要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塔语言学校的师生们发表演说。但是，在那政治生活沸腾的时代，村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这个演讲会。学校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许多村民坐在地板上，甚至坐在讲台下面。我朝会场上望了一眼，便决定呆在外面——至少暂时呆在外面更好一些。

院子里，五、六群人在不同的地点围成圈子跳舞。“妇女同盟”的姑娘们身穿贵重的阿克拉布制成的节日服装。尽管气氛嘈杂，还是可以听出一位歌手清脆嘹亮的歌声，人们都尊敬她，管她叫“留声机”。对姑娘们的跳舞，我可以不去理睬，而“留声机”的歌声却不得不听。她正在赞扬迈卡，说迈卡的俊美举世无双，象石雕的山鹰般英俊无比；她称颂他的名望，说即使走遍天下、扬名海外的游侠骑士对他也不

能不生嫉妒之心。自然，这位迈卡就是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

狩猎协会的猎人们一式华丽的衣着，他们的来到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甚至“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顿了片刻。这些猎人是难得露面的，除非他们中间哪个死了，要举行葬礼，或者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他们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我记不得上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了。他们象摆弄玩具一样，挥舞着装填了弹药的猎枪。不时会有两个人脸对着脸行军人礼，并一同拍击枪身，拍拍左面，又拍拍右面，拍完右面，又拍左面。母亲们紧紧抓住孩子，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拉走了。偶尔会有一位猎手瞄准远处的棕榈叶，一枪打断粗实的筋叶。于是，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喝彩。当然，射击声是零零星星的。大多数猎人都保存着珍贵的弹药，以便迎接部长的到来——自从本届政府掌权以来，弹药的价格也同其它物品一样，四年里翻了好几番。

我远离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等候部长的光临，此刻，嘴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强烈的苦味。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正在扭腰顿脚地跳蹦，等候鸣放欢迎的礼炮，以便向那位使全国掉进通货膨胀深渊的、了不起的人物致敬。我盼望盛况到来，盼望听到雷鸣般的欢呼，盼望这一荒谬可笑的庆典尽快结束，好向这些卑微不幸的人讲述一两件真事。当然，这样做会是徒劳的。他们不仅愚昧无知，而且玩世不恭。我告诉他们说，这个人曾利用他的地位大发横

财，他们却会反问你（我父亲也这样问过）：“你是不是以为这样一个聪明人会把他走运时吞进肚里的美味佳肴再吐出来？”

我并非从不喜欢南加。大约十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好象还挺受他青睐呢。我还记得，当时他是一位受人爱戴、年轻英俊的教师，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当童子军教练时穿的那身制服。校舍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上面也是一位穿着极为合体的制服、俊美无比的童子军教练。我不知创作那幅油画的美术老师是不是以南加先生为模特儿的。脸形稍有不同，可我们还是称它为南加先生的画像，因为他们二者同样漂亮，同样是让人看见就忘不了的童子军教练。画上的人物双臂交叠在胸前，右脚抬起，轻松而自然地踏在一墩平整的树桩上。画框的四个角落里点缀着鲜嫩、红艳的木槿花；框下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题辞：不求索取，但求奉献，这是我的信念。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南加一定是在那不久之后进入政界的，后来又在议会上谋得了一个席位（在那些日子里，搞到一个议席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席位的价值）。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还颇以此自豪哩！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到了一九六〇年，党内出了那些丢人的事，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那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南加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后座议员。普选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

此不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在我们看来，差不多就这么短暂），政府便面临着险恶的金融危机。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曾获公共金融博士学位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为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

内阁总理对该方案一口否定。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不想削减支付给咖啡种植园主的资金，从而冒失去选举权的风险；他打算要国家银行印刷面值一千五百万镑的钞票。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起而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当晚便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称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与国外颠覆分子相勾结，以图摧毁新生的政府。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广播。自然，当时无人知道真相。报纸和广播都依照内阁总理对该事件的说法行事。我们当时也同仇敌忾。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对领导人的信任投票，要求颁布一项拘留法，以便对付那些恶棍。整个国家都紧跟在内阁总理之后。示威游行和抗议的浪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

就在这时，就在这遍及各地的抗议声中，我首先注意到了一个危险而不吉利的新的征兆。

人民组织党的官方报纸——《时事日报》，在一篇社论

中指出，那群匪徒，即受到这种谴责的、解了职的部长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大学资历的专门人才（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篇社论的剪报）。

我们要象牙医拔除蛀牙那样，不仅现在，而且永远，要从我们的国家里铲除那些只会照搬书本上的经济学、只会模仿白人习气、只会跟着白人嚼舌头的家伙。我们为做非洲人而自豪。我们的真正领导人不是那些陶醉在牛津、剑桥或者哈佛学位里的书生，而是那些讲人民语言的人。废除那些糟糕而昂贵的大学教育吧，它们只会使非洲人与非洲的财富和古代文明疏远，只会让他们骑到人民头上。……

这一呼吁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响应。其它报纸也指出，即使在英国，在那群匪徒受过所谓“教育”的地方，出任财政大臣的不一定是位经济学家，做卫生部长的也不一定当过医生。重要的是对党的忠诚。

那天，内阁总理得到了压倒多数的信任投票，当时我就坐在公共议席里。然而那一天，真理并没有被压垮，只是没有人来认真聆听罢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解了职的财政部长极度悲伤地率领着他那一批人走进议会大厅，受到党员和群众的大声嘲骂。就在那个星期，愤怒的群众砸毁了他的汽车，向他的房子扔了石块。另一位解了职的部长被人从自己的汽车里拖了出来，人们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以后，在马路上拖了五十码远，然后缚住他的手脚，堵住他的嘴，丢在路旁。直到议会开会时，他仍住在医院里。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议会。那也

是自一九四八年南加先生教我以来，我重新见到他的一次。

内阁总理讲了三个小时，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欢呼。人们称他是老虎，是狮子，是天空，是海洋，是独一无二的伟人，赋予他数不清的美誉。他说：“这伙匪徒阴谋借助国外的敌人来推翻我们这个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我们已经抓住他们的血手了。”

“绞死他们！”坐在后排的南加先生高声叫道。这一声叫喊是如此响亮和清晰，以致在当时的议会记录中，也被作为发言记在他的名下。整个会议中，他领着后排那批犬儒之辈，气势汹汹地向那些牺牲者发动毫不停息的攻击。要是有人想概括一下南加先生的插话，那他所记下的将是一个多小时连续不停的叫喊。他时而跳起来打断演说，时而坐下去发出恶狼般的嘲笑声，汗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淌。

当内阁总理说，他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提拔起来，而这帮家伙却在背后放暗箭，有些党员听了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他们的母亲养大了他们，他们却咬断母亲的手指！”南加先生喊道。这话也载入了会议记录，我手头就有一份副本。不过，要把那天的紧张气氛在书面上充分表达出来，可不是容易办到的。

我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了。我只对那时的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你也一定记得，当时谁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对这个事件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内阁总

理还在演说。接着，他作了当今著名的（或说臭名昭著的）宣告：“从今天起，我们必须严密警惕，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再把我们的命运，把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西方教养出来的杂种，交给那些光会摆绅士架子的臭知识分子们去摆弄，他们为了一碗肉汤，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亲。……”

南加先生把“绞死他们”的口号至少又喊了两遍，不过，这可没有载入记录了，显然，那是因为普遍的喧嚣淹没了他的叫喊。

我还记得财政部长马金德博士站起来说话的情景——他个头高大，神情悲怆，看上去泰然自若。我竭力想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可是整个议会大厅，包括内阁总理，都在不停地叫喊，想把他哄下台。那真是一幕最滑稽而粗野的闹剧。主席假惺惺地敲击木槌，以维持大会秩序，可你分明看得出，他对这场骚乱真是乐不可支。公共席上漫骂声四起，“卖国贼”，“胆小鬼”，“出卖老娘的博士”。最后一个称呼是公共席中《时事日报》的一位编辑发明的，他当时就坐在我的近旁。不用说，这句妙语立即在公共席上赢得一阵狂笑，他因此大受鼓舞，决定第二天一早让这个称呼见诸报端。名字就署他本人。

尽管马金德博士读完了他精心准备的演说稿，可是后来的会议记录却断章取义地记载了一篇文理不通、意义含混的文字。关于印刷一千五百万镑钞票一事，只字未提——这也许是在预料之中——可是为什么却把马金德决不可能

讲出的话硬塞进他的嘴里呢？总之，记录员记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演说，足以把前部长变成一个傲慢的反面人物。比如，他们让他自诩为“一位成就辉煌的经济学家，他的名望在欧洲备受赞扬”。当我读到此处时，我流泪了——然而，我不是个轻弹眼泪的人。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这段可耻的插曲，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对那位眼睛盯着空缺的部长席、为某得一个升迁的机会而恬不知耻地嘶声嚎叫的尊敬的姆·阿·南加先生，我没有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主人兼校长是一个瘦小、硬朗的人，名叫乔森纳·韦格。他在地方评议会中是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但他总是牢骚满腹，那是因为他为人民组织党工作，人民组织党却不按通常支付公共团体和个人酬劳的惯例付给他报酬。尽管不满，他并没丧失信心；他为这次接见作了精心的安排，就是证明。也许他对建议中的新机构怀抱希望，该机构有可能接管政府对所有废旧物资的处理权（诸如旧床垫、椅子、电扇、废打字机及其它破烂什物），而目前这些废物是由文官负责拍卖的。我真希望他得到委任。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经常远离学校。

他坚决主张设置警戒线，并让学生们从大路到校门口排成一长列欢迎队伍。教师在学生的队尾，整整齐齐站成一行，以便接受部长的接见。韦格先生经常阅读诸如“烤面包——怎样摆放面包片”一类的文章，他对这类事情考虑得真是细致入微。我曾激烈地反对让学生们在我们教工会议

上列队旁听，并试图号召其他教师一同起来反对。可那所学校里的教师们，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已经僵死了。我的同事兼朋友安德鲁·卡迪伯认为他难以赞同我的意见，因为他和这位部长是同乡。我把他的做法叫做“幼稚的忠诚”。

部长的“卡地拉”轿车在一长串汽车前面刚刚停下，猎人们便冲上了公路，射出了最后的弹药，并以吓人的动作把枪枝抛上天空。舞蹈家们又是跳跃，又是跺脚，弄得旱季的空中灰尘弥漫。喧闹声中，“留声机”的歌声也被淹没了。部长缓缓步出。缎子礼服，金项圈，珍贵的兽皮制成的手扇向公众频频挥舞致意，人们赞扬说他这把扇子搧掉了恶魔向他射来的一切阴谋和毒箭。

先生仍象从前那样漂亮和年轻——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校长这会儿正从排头第一位年长的教师起，依次把他们介绍给部长。我虽没有仔细辨认那位老教师的外貌，也决不怀疑他的鼻孔里照例留着鼻烟的痕迹。部长兴致勃勃地向每个人都问了安。你决不会认为——哪怕你现在看见他——他的笑容里除了真诚，还包含着什么别的。看来一切残忍都是不可相信的。现在轮到我了。我局促地伸出手。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会认出我，也不打算提醒他。

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了。我直盯着他的面孔。他脸上沉思的皱纹里慢慢绽露了微笑。他不耐烦地挥挥左手，以使那位啁啾不休的校长停嘴；校长如同鹦鹉学舌，重复他那说了不止十五次的客套话：“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

“知道了，”部长象是对他记忆中的某个下属说道。“你是奥迪里。”

“是的，先生。”没等我回答，他已经伸出双臂来同我拥抱，把我包在他那宽大的缎袍里。“你的记性真好，”我说。“至少十五……”这会儿他已经把我放松了些，可他的左手还搭在我的肩上。他向校长稍微侧了侧身，骄傲地宣告：

“我教过他……”

“三年级，”我补充道。

“一点不错，”他叫道。即便是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儿子，也不能比他此刻更激动了。

“他不愧是我校的顶梁柱，”校长受了感染，随口称赞。从我进了他的学校，他还是第一次夸奖我。

“了不起，奥迪里，”部长孩子般地叫道，仍然气喘喘的。“这些年，你一直在哪儿呀？”

我告诉他，我上了大学，过去十八个月一直在教书。

“好家伙！”他脱口道。“我早知道他会上大学的。那时我就常常告诉班上其他的孩子，奥迪里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人们会‘先生、先生’地称呼他呢！什么时候毕业的呢，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样可不好，你知道。”

“哦，”我高兴地答道——我真羞于承认——“我知道部长多么忙……”

“忙？哪里。你难道不知道部长就是仆人吗？再忙也要看望他的主人呀！”

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喝彩，都快活地笑了。他又拍拍我的背说，等接见完了一定不要忘记去看他。

“你要是忘了，我就派我的传令兵去逮捕你。”

我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我茫然不知所措。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喧闹声也好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想，我应该生自己的气，可是没有生气。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用过于苛刻的标准来看待政治，而这政治本来用不上这种苛刻的标准。在我回到现实以后，我听见部长正在对另一位教师说：

“那很好。有时，我真后悔永远离开了教育领域。虽然我今天是一位部长，可我对天起誓，我远没有当教师时那样愉快。”

我的记忆力当然没有毛病。那天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不知他的感慨由何而发，可我能回忆得起部长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他后来作的演说，我也能全部复述出来。

“天啊，”他一再说，“我常常后悔。教书是桩极其高尚的职业。”

此刻，所有的人都快活地笑了，只有尊敬的部长先生本人，还有我，因为那个玩笑而没有笑。那时候，全国的教师都处在不满之中，情势一触即发，只有他才能开出这样危险的玩笑——也许，他就是那样想的，也正想那样做。笑声平息后，他摆出一副较为严肃的面孔，向我们透露：“你们放心好了，内阁中出身于教师的阁员们，是站在你们一边的。”

“当过教师的，永远是教师！”那位老教师赞叹道，一边

拂拂他从箱底翻出来的晨礼服的肥大袖子。

“金玉良言！金玉良言！”我叫道。我想，这话听起来是有讽刺意味的。要明白这个人有多大的媚态，需要亲身体验一下才能够相信。我要是迷信，就会说，他做出的媚态不过是一种“甜面孔”而已。

稍稍换了个话题，部长又说道：“只有教师能够做出如此卓越的安排。”然后他转向随行的新闻记者，说：“真是一支庞大的群众队伍。”

记者急忙掏出笔记本，写了起来。

“在阿那塔，这样的欢迎队伍前所未有的。”韦格说道。

“詹姆斯，听到了吗？”部长问记者。

“没有，先生，他说什么？”

“这位绅士说，在阿那塔，这是最最前所未有的欢迎队伍，”我接口道。这次，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的舌头是在我的嘴里。

“那位绅士叫什么名字？”

韦格先生自报了姓名，逐字地拼音，不仅如此，还报出了他的职衔全称“阿那塔语言学校主人兼校长”。接着，他向部长谦恭地叙述，他对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如何尽了他的微薄义务。

“我亲自走访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把您的——我是说部长的——光临告诉了他们。”

这时我们已经进入会场，部长及其一行都被邀到主席台。群众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向着大厅的各

个方向挥扇致意。然后转向韦格先生，说：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在部长随行人员中，一位身材高大、容貌粗陋的汉子，和我们一同站在主席台的后面，这时提高嗓门说道：

“听我说吧，向每一个比部长年长的人称呼一声‘先生’，这样的部长能找到几个？请问你们，能找到几个呀？”

主席台上的人都交口称赞，身居高位、却还如此尊敬长者，这样的人难得遇见，部长在这方面确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如此热情地赞扬，倒使我有点发窘，这无疑说明我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正在发生变化。

“不管当部长也好，不当部长也好，”他说，“谁是我的长辈，那么他就永远是我的长辈。别的部长和别的人随他怎么做，而我的座右铭是：行我权力，羞煞魔鬼。”

他不故作谦虚，倒令我有点羡慕。难道谦虚不也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傲慢？我们都自认为是上等人，但可以认为，是谦虚阻止了我们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并不会阻止我们希望别人这样称呼我们。也许正是这种伪善的权力欲，使南加这样的人变为成功的政治家，而那些眼睛瞪得老大的理想家们，却试图将其它领域那种美妙高雅的行为带进政治。

当我的思绪滞留在这里的时候——也许想了许多——，肉麻的赞扬不断在主席台四周回响。

韦格先生乘机亮出他那惯于卖弄的一手。部长先生的优秀品质，他评论道，是由于在教育还称得上教育的时代，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